



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的认识

薛 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 南京 210044)

摘要: 鸦片战争知彼知己的需要,使中国人通过《四洲志》一书初识了英美国家的议会制度及其价值。议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介绍到中国后,到同光时代,得到了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同。他们从“三代”遗风中发掘出议会制的历史和理论基础。梳理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的认识的过程可知:体认西方议会制既是近代中国了解把握西方民主的门径,也是后来变法和立宪——中国二千多年道统之变的先声。

关键词: 士人;西方议会制;认识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07)02-0051-07

我国自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道统精神是君主专制,天下为私,上智下愚,风从草偃。明清以降,随着宰相制度的委弃,专制程度走向极致。至清代,大臣对皇帝自称为“奴才”,庶民读律视同犯罪,生员对“军民利病有一言建白”便是“违例”,要受惩治。然而,1840年以后,国人在奋起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当中,咸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明锐之士在了解西方国家的器物、政事和制度中认识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起而介绍,继而推崇,再而思效。这样一种心路发育到同光年代基本成形,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二千多年道统之变的重要阶段。^[1]

一、鸦片战争催促“知彼”

19世纪前期是欧洲列强挟其制度、资本和科技的优势对外不断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其它地区无法继续闭关自守,与其交流日增的时代。1840年代以前,我国民间已经有留意于西事者记述欧美等国情况,如叶钟进撰《英吉利国夷情记略》(1834年);肖令裕撰《记英吉利》(1832年);方东树、梁廷枏修《粤海关志》(1836年)等。其中客居广东的安徽歙县人叶钟进最早记述了国外“公举”的政治制度。叶钟进在《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记述美

国:“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必众服而后立。故其人最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但这些著述对国外情况的记述是如此之少和流行范围之小,以至当1840年夏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对敌手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842年5月,鸦片战争正酣时,道光帝在四月初六(5月15日)的一份谕旨中,要求台湾总兵达阿洪从抓获的“逆夷”俘虏中摸清并回奏:“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除璞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这份谕旨表明了,是战争的需要迫使国人打探“夷情”,以求知彼知己。

1839年3月,在虎门销烟以后意识到与英国战争势在难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为了解对方,请人根据英人莫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地理位置、风俗习性、政军制度等情况的著作《四洲志》。由此,中国人的视野中出现了西方议会制。《四洲志》对英、美等国议会制度介绍道:

“(英国)由英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内派管大部者百四十三名,管小部落者三百二十四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四名。由威尔士(威尔士)议举五十三名,内派管大部者三十名,管小部落者二十三名。由爱伦(爱尔兰)议举百有五名,内派管大部者六十四名,管小部落者三十九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二名。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议会 Parliament)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内阁 Government Governhouse)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国王颁巴厘满,转行甘好文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覈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美国“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总统 President)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参议院 Senate)会议而后举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设立袁额里士衙门(国会 Congress)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司(众议院 Representatives House)。在西业执事者,曰西那多(参议员 Senator),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九年,而年至三十者,方为合例。专司法律、审判词讼。如遇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为西那多议允施行。常坐治事者,额二十人,曰士丹吝甘密底(常委会 Standing Committee),无额数者,曰甘密底(委员会 Committee),皆西那多公同拈阄,以六月八日为一任,期满复拈阄易之。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曰特底甫(众议员 Representative)。由各部落综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所举之人,须居首区七年,并年至二十五岁者方合例。以现在人

数计之,特底甫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碧加一人总其事。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均由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特底甫亦可判断。常坐治事之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由士碧加(议长 Speaker)于各特底甫中,拣派二十九人,以六人专司会议,其余或理外国事宜,或设计谋,或理工作,或进耕种,或理武事,或理水师,或理公众田地,或理案件,各司其事,以一年期满,再由士碧加选代。”“每岁十二月内第一礼拜日,则滚额里士衙门之西那多,里勃里先衙门之里勃里先特底甫,齐集会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贷诸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铸钱轻重大小,或议海上盗贼如何惩治,或国中重狱有无冤抑,或搜阅士卒,增益兵额,或释回俘虏,或严立法律、惩服凶顽,或他国窥伺如何防御,一一定议。”

这是中国人对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议会制最早的介绍。不长的篇幅中描述了议会的组成人员、产生方法、职能和作用、与行政当局的关系。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带有情报性质的《四洲志》不会达于“上聪”,因而到1842年5月道光皇帝还未“御览”。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促使朝野极少数有识先进之士希望透过外敌的“船坚炮利”了解更多的外部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四洲志》的内容因而得以承传。

二、发现议会制的价值

1842年底,魏源在镇江受获罪遣戍伊犁的林则徐之托,根据《四洲志》等其它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并在1847年和1852年两次陆续增补至一百卷本。此后,参照大致相同的资料来源,1846年,广东学者、史学家梁廷枏刊出《海国四说》;1848年,山西进士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此外,还有广东生员陈逢衡撰的《英吉利纪略》(1841年)、汪文泰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年)等。这批著述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列强的概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其可以作价值判断的政体制度方面,诸书并未表现出对“西夷”的鄙否,相反,不时有揶揄向慕的评价。

魏源撰的《海国图志》在《四洲志》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英国有“五爵之会”(上院)和“乡绅之

会”(下院)的“巴厘满”与国王的权力配置:“国王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描述议会的地位和作用是:“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人之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并且,又叙述了与议会有相辅相成之效的新闻报纸的作用:“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书中对当时美国国会介绍道:“米利坚政最简易,赋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同时,书中还记叙了美国州议会的选举办法。魏源评价美国的政制“可垂奕世而无弊”,指出“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梁廷枏撰的《海国四说》在介绍英、美国家议会制度之余,特别推崇美国“凡国事既遇民共议”和“统领限年而易”的共和政制。在《合省国说》序文中梁廷枏写道:“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

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餽斯已耳。”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于诸书所记之外,又记述英国议会制“爵房”和“乡绅房”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爵房者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象魏源、梁廷枏一样,徐继畲也仰慕美国政制,认为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赧赧乎三代之遗意。”

这批开风气之先的著述对“天朝”之外“海陬蛮夷”政治制度的推介,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是与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典籍、制度精神截然不同的。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诸书作者在批评语中对像“公议”、“公论”、“公举”等西方政治体制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不过,在当时的朝野上下,人们专注的是如何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当《海国图志》刊行之时,人们对“筹海三策”等御敌方略的兴趣远高于对议会制度的解读。《四洲志》等书中对国外议会制度的介绍只能说是惊鸿一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刊印后在日本国内极受重视,甚至洛阳纸贵,但在国内近三十年士大夫圈子中反映冷淡。或有和继者,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公黜陟”议论亦是知音寥寥。

三、再度认识议会制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再次败北和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西方的器物、政事及制度刮目相看。1866年,清王朝第一次派出年事已高的斌椿随英人赫德出访欧洲,以后对外派驻使节逐渐增多。根据总理衙门的规定,“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

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故而驻外使节亲历西方以后,既有兴趣,也有义务在其日记、奏稿、书信中对所见所闻的西方各国议会制度进行了解,加以记载,予以评价,择要报告。同时,总理衙门等也将驻外使节寄回的日记印送有关方面阅看,以供参考。驻英公使郭嵩焘日记《使西纪程》就是这样刊行后,在光绪3年被编修何金寿弹劾为“有二心于英国”,诏令毁版的。这些著述由于作者能够亲历亲见亲闻派驻国的情况,所以,大都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西方的议会制度、议会活动甚至议会人物。与此同时,在通商口岸新兴城市中,有机会接触了解欧美情形者也日益增多。这两部分人中的明锐之士为人所知晓的有郭嵩焘、曾纪泽、李凤苞、张荫桓、薛福成、崔国因、郑观应、王韬等一批驻外使节或商务买办。他们感于日益加深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中,“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传统的儒学治平“经典”捉襟见肘,无以应对。因而在引进学习西方器物之利,兴办洋务的同时,亦有心抽丝剥茧,了解船坚炮利背后的制度支撑。

思想观念变革的另一来源是大批来华的传教士。在他们中间,人们熟悉的有麦华陀、麦都思、莫理逊、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他们来华不仅传教,同时亦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给城市口岸、通邑大都的士人市民带来了新知新识、新见新闻。中国幅员广大,方言纷杂,但文字却是统一的,这给报纸的传播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便利。自从1833年8月德籍传教士郭士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在广东创办了第一份《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后,至1890年,外国在华所办的报刊先后已经达到76种。其中大半是教会所办的报纸。各种报纸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从《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改名而来的《万国公报》。该报曾多次连载长篇文章,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如1875年6月12日刊载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详细准确地介绍了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又如1880年4月10日刊载的《环游地球略述》中第一次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天皇的五条誓文,第一条是“欲设国会如会议堂然”,第二条是“欲凡事必由公议始定”。另外,象李提

摩太等人在中国,上进侯门,下入草堂,官绅两洽,雅俗皆宜,与李鸿章、翁同龢及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交往。像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一样,与他们的接触交往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认识西方世界的又一渠道。

风从欧美来,水自华夏起。同光年间,《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越来越流行。版本学表明这两本书在在同光年间曾多次被翻刻,蒸蒸日上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2]而更多新的有关西方的地理风俗、制度典章的评介在这期间也纷纷刊印,其中涉及西方议会制的著述层出不穷,如斌椿的《乘槎笔记》(同治9年);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同治10年);孙家毅的《使西书略》(同治7年);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光绪3年);黎庶昌《西洋杂志》(光绪3年);沈纯的《西事类编》(光绪13年);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光绪9年);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光绪3年)、《使英杂记》、《使法杂记》(光绪9年);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光绪13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光绪14年);汤震的《危言》(光绪16年);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光绪17年);陈虬的《治平通议》(光绪19年);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光绪17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光绪18年);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20年)等等。在这些著述中,和先前《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相同的是,多数著述对西方议会制等政制也是作为一国的风俗地理,财经科技、制度文化的一部分来介绍的。不同的是,作者往往更加直率地表露出对其政治制度的肯定和向往。从而托显出“本朝”的制度典章乃至风俗文化方面的不少弊病。

首先,对议会的具体运作情况进行了观察和描述。驻外使节能够由于有机会去参观议会的活动,对议会的具体运作有了直观的了解。赴美使节志刚在国会议事之期,应议长之邀前往观察,“堂前列坐绅耆数十人,中间有坛,坛上有会首高座宣讲。如堂上所言,堂下则诺;不然则否。不相强也。否者任其倡言驳议,公同听之,归于从众。”崔国因在美旁听国会时,注意到议员开会备有案、纸、笔,以便议员讨论问题时“有所见,则书于纸,刊于报,示

至公也。”驻英公使郭嵩焘记述英国议院中“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滋弊易多。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亦久矣。”郭嵩焘在与副使李凤苞的探求讨论英国政制的得失时，指出：“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安其位。自始设议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意志，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所隐避，积之久而亦为风俗。”薛福成在日记“英国之公保两党”题目下记载到：“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保党为宰相，则保党在院皆居右，而公党居左；公党为宰相，则公党居右，亦如之。”“法国左、中、右三党，而三党之中，所分小党甚多，又有君党、民党之别。其人皆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凡宰相所行之政，议院中是之者少，非之者多，则宰相必自告退。……由伯理玺天德另举一人为宰相。”驻美公使崔国因指出了三权分立制度下行政权限度：“立例者，议院；行例者，总统；守例者，察院。议院立例之权，则大事为议院主之，总统不过奉行耳。”

其次，对西方政制进行了分类考察，以择善而从之。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以议院与君主的权力关系不同，将西方国家划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其中，中、俄、德、奥、土、日等国为“君主之国”；美洲各国及欧洲法、瑞等国为“民主之国”；英、荷、比、西、葡、丹等国为“君民共主之国”。在这之中，“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为最好。薛福成指出：“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述了“法国上下议院之权高于总统”的情况，以“伯理玺天德（总

统）”在中法教案交涉中对法国在华教士“无理取闹”、“横恣为难”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一事，就“民主之邦”的弊端作了佐证。郑观应对欧洲的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普鲁士、日耳曼联邦、丹麦、英吉利、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挪威、瑞典、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 16 个国家的议会制度的不同之处作了扼要的说明，评述了当时欧洲各国上下议院的“公举”制度利弊优劣及其特点，有助于人们具体地认识西方议会制。

最后，在考察的基础上得出对议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将议会等近代政制看成西方立国和强盛的重要原因，论证学习仿效之理。郭嵩焘 1879 年使英时对其议会制历史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其原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 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散，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志刚对美国的议会述评到：“赋税出于民者，下堂（众院）议之；条约法令出于上者，上堂（参院）议之。亦必上下询谋佥同，或议从其数之多，而后上其议于伯理喜顿，听其照准施行。故民情达而公道存。”陈虬以为只是效行“泰西各国”的“矿务、铁路、电线、制造诸法，以及广方言馆、水师武备”是不够的，因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王韬指出，英国“国有大事，则集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必众志成城也。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由是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曷曷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郑观应后来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指出：“欲籍公法以维持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之本也。”

以上对欧美诸国议会制的肯定,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曾总结性地表述道:“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而民众不能按户而说,执途而语,故由民举其能贤者,代民达隐。陈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黷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倖;官不能怙权固位,极法营私,病民蠹国。故风引景从,不崇朝而遍欧美。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

四、“以夷变夏”之据

清朝士人中明锐之士并非是对传统的政治文化根底浅薄或妄自菲薄之人。他们对西方议会制的认同不是偶然的。除了佩服西方的器物先进及后面的制度支撑外,正是因为他们中国文化的学养传统,使得他们从中国上古的政治文化中看到了西方议会制度的原始因子。中国人过去的历史观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总是认为美好的日子是在远古的唐尧禹舜,前世之事,后世之师。而“三代”及战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中族群邦国民主性质的史迹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对秦汉以来中国“家天下”的道统已经有深刻的反思。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著作中有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思想。乾嘉考据学派对远古文献的考据使得人们能超越程、朱理学的藩篱,对《诗》《书》《礼》《传》原旨加以理解。所以,见闻西方议会制度之后使他们找到了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感觉。

王韬在 1883 年(光绪九年)就已经认为:“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夫尧舜为君,尚赖有禹、皋陶、益、稷、契为助而天下乃至。今合一国之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犹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宋育仁认为:“察议院之制公举于乡,进而议政,如古之乡校。”郑观应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来证明议院的合理性,要求:“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一位自称“匿名”的作者在其文章中声称西方议会“偶合”于中国古时的“明台之议”,《尚书》中的

“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是为上议院下议院之明证。”“中国诚能以礼失求诸野之意,稍师其意而行之,群四百兆之心思,濯百余年之积习,庶几已失之权利可设法挽回,后来之弊窦可以事先筹防。”

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皇帝国君自以为受命于天,视江山社稷为自己私有。西方议会制思想的引入,使士人已经察觉到其理之非。郑观应曾经痛斥战国之后“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的恶政。

这种用“中国古已有之”的“三代遗风”来比附议会制,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源的论述既能“托古改制”,又能在西化冲击下保持和发扬民族自尊。况且,从《诗》、《周礼》等经典看,周以前的不少邦国确实有族群民主咨商制的存在,从而成为“天下为公”的表现之一。如《诗经》中有:“先民有言,询于刳菑”;《周礼》中有:“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询国危,二询国道,三询立君。其位:王向南,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周官·小司寇》)等等。所以,同光年间的士人常常认为中国上古经典中就有议会制之义,只是秦以后,“其理顿晦”。这是一种真诚的鉴古追思和现实感悟,并非思效西制的策略之举。

在上述与日俱增、不断拓展的认识基础上,奏请清廷效行西方,开设议院的建议也陆续浮出水面,并成为期望以“变法”图强的人们追求的目标。1883年,身为庶吉士的崔国因在《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第一个建言清廷开设议院。军机处讨论之后“留中不发”。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病逝前口授的遗折中剀切地指出,西人立国,“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赜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歟?”故而恳请清廷尽快“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在 1890 年至 1894 年间,汤震、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已经在其著述中

多少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构想。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谋而思动, 标志着国人至甲午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

五、结论

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是西方议会制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中国人了解西方议会制度最初是为了在战争中知彼知己。而对其产生好感, 甚至一见如故实属无意插柳成荫。议会制度思想及运行的介绍引入使得中国人从“他者”的立场上反思“本朝”的政治制度, 是中国人政治哲学思辨中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上古文献中记载的族群邦国中民主制遗迹是清朝士人认为清朝政制仿行西方议会制的理论和历史依据。因而, 他们对属于西方“舶来品”的议会制度不仅不感生疏和异端, 反而认为是找到了久违的“道之大原”。

甲午战争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度是述评性的。在批评的过程中士人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制度的认同。中国人认识现代民主政治是从西方议会这一具体制度的优劣得失起步的, 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的。当时的士人对议会制度的引介并未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只是止于介绍, 无所取法的层面。他们在对议会制度价值性揄扬中已表取法之意, 后来并明确提出了设立议院的要求。当然, 它与戊戌变法前后设立议院的呼声腾于朝野的情形相比, 还属先行者的发抒。但是, 这已经足以成为后来的变法及立宪思潮和运动的先声。

注:

[1] 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论著对本文论题多有涉及, 如《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熊月之, 1986); 《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 1996);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耿云志, 2003)。本文则是比较全面系统地对甲午之前议会制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远近原因及对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作用、意义作了研究。

[2] 《海国图志》初在咸丰 3 年扬州古微堂刻印后, 分别有同治 7 年郴州陈氏刻印、光绪 2 年魏光燾平庆泾固道署刻印、光绪 3 年巴蜀成善堂刻印、光绪 6 年邵阳急当务斋刻印、光绪 21 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光绪 24 年上海文贤阁石印等版本。《瀛寰志略》在道光 28 年刻印后, 分别有咸

丰 11 年对焗阁刻印、同治 12 年扶云楼刻印、光绪 6 年刻印、光绪 24 年新化三味书室刻印、光绪 24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光绪 28 年上海日新书局石印、光绪 32 年广州广东书局石印等版本。参见姚佐绶、周新民、岳小玉合编: 《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第 221 页。

参考文献:

[1] 叶钟进: 《英吉利国夷情记略》, 转引自《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72 年 11 月版。

[2] 《清实录·[三八]·宣宗成皇帝实录(六)》中华书局,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3] 林则徐: 《四洲志》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4] 魏源: 《海国图志》卷五十一; 岳麓书社, 1998 年 11 月版。

[5] 梁廷枏撰: 《海国四说》,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6] 徐继畲: 《瀛寰志略》,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版。

[7] 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4 月版。

[8] 林乐知: 《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第 584 卷。转引自王林: 《西学与变法》齐鲁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9] 志刚: 《初使泰西记》,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二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73 年版。

[10] 崔国因: 《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二》,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11]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2]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13] 陈虬: 《上东抚张宫保书》温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

[14] 郑观应: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5] 宋育仁: 《泰西各国采风记》王锡祺编: 《小方壶舆地丛钞》第 19 卷, 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版。

[16] 佚名: 《泰西各国多以议院政治中国亟宜改革效法论》《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

[17] 张树声: 《遗折》何嗣焜编: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重编连续页码第 559 页。

〔责任编辑: 兆 录〕